

《沉舰佚事》:1937年上海抗战记忆

□何颖(书评人)

翻开这部《沉舰佚事》，仿佛推开一扇通往1937年上海租界的沉重之门。

作者在这部长篇文学新作中，构建了一座记忆的“孤岛”——它既是被日军铁蹄包围的地理事实，更是无数个体在遗忘的潮水袭来前，垒起的精神高地。这部作品并非简单的抗战往事，而是一场关于“记录”与“遗忘”、“日常”与“非常”的深邃对话，一部在民俗烟火与历史硝烟的交织中，探寻民族记忆的文学碑铭。

作者深谙最坚韧的抵抗往往始于最寻常生活的执拗延续。他笔下的上海民俗——不仅是风物，更是市声、气韵、节奏与人情网络——构成了故事沉实的底板。这种对日常性的巨细靡遗的描绘展现的是，在大的背景下，小的生活以惊人的惯性滑动。然而，作者

不止于呈现一种美学的对照，他将民俗升华为一种无言的抵抗形式。当主人公，那位战地记者，穿行于这些街巷时，他所记录的不仅是日军的暴行，更是这看似脆弱的日常生活本身如何成为一种不屈服的宣言。

全书的核心张力，聚焦于“记者”这一身份。他以“笔为枪”，游走在沦陷区的刀锋之上，在油墨与硝烟的交织中雕刻真相。揭露日军的暴行累累，铭记国人的不屈坚守。既是历史的忠实见证者，更是隐秘使命的坚定践行者。这让人联想到二战时期无数真实的战地记者，如中国的曹聚仁、萧乾，或西方的罗伯特·卡帕，他们的工作本身就是历史现场的一部分。作者凭借其翻译《民国采访录》的深厚功底，将这种历史重量刻画得入木三分。

书中最为精妙的一笔，莫过于那只名为“大师”的白猫。它绝非宠物式的点缀，而是一个具有高度象征功能的情感枢纽和人物宿命的联结。猫，在文学传统中常与神秘、旁观、灵性相连。从夏目漱石的《我是猫》到帕慕克笔下伊斯坦布尔的街猫，“猫眼”提供了一种超越人类中心局限的观察。白猫“大师”的静默与灵动，形

成对人类世界喧嚣的奇异映照。它“用灵动眼眸记录人间冷暖”，这记录是无声的、生物性的，却恰恰补全了记者文字记录之外的那个感官的、情绪的真实上海。它的存在，是“乱世中最治愈的慰藉”，更是一张活着的、温暖的镜子，映照出人性在绝境中依然可能保有的温柔与联结。在历史宏大叙事碾过个体命运的齿轮下，“大师”代表着那些无法被完全规训、无法被彻底征服的野性的生命力量，它是无常中的一份恒常，是冰冷图景里一抹“柔软却坚韧的光”。

从《1938上海往事》到《沉舰佚事》，作者持续深耕于上海抗战这一历史富矿。他不仅是一位小说作家，更是一位凭借《帝国的残影》等著作对历史档案与集体记忆有着敏锐洞察的思考者。《沉舰佚事》可视为他这一思考的文学性凝结；我们如何记忆？日常生活的纹理在历史面前有何意义？书中，记者用生命镌刻的文字，形成了记忆的保存；真正的“沉舰”或许会被时光的泥沙覆盖，但那些围绕它生发的“佚事”——那些个体的悲欢、街巷的气息、无声的陪伴——却可能以另一种形态浮起，成为后来者打捞真相的浮标。

·门外弹乐·

如此闹场绝不应该

□梅明蕾

日前，著名华人音乐家谭盾获得由贝多芬故居和韦格勒酒庄联合发起的“贝多芬友谊奖”。贝多芬故居主席、著名小提琴家丹尼尔·霍普在颁奖辞中说：谭盾以东方视角解读贝多芬，为近年来贝多芬作品的演绎与传承，注入了独特的感染力。霍普还说，中国有句老话，和谐并非消除差异，而是达到差异间的平衡（我认为这可能是“和而不同”的西化翻译）；（音乐）只有在对比与对话中，方能跨越文化，叩响人们的心弦。

笔者虽未亲聆过谭盾演绎的贝多芬，却清楚同为经典的富特文格勒、卡拉扬、切利毕达克和阿巴多等大师们手下的贝多芬有怎样的差异；也好奇，以东方视角解读的贝多芬还是贝多芬吗？现在谭盾获得了“贝多芬友谊奖”，起码可见其努力得到了西方古典音乐界的认同。

联想到前不久发生在国家大剧院的闹场：库伦齐斯指挥音乐永恒乐团的演奏还未完全终止，场内却突然有人对演奏大声叫骂，指挥、乐手顿时惊愕，听众由发蒙而激愤，幸好工作人员及时将闹事者请出会场，短暂的闹场方得止息。

事后得知，乐团当时演奏的是瓦格纳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简称“指环”）的无词版，即所谓“无词指环”。“无词指环”由指挥大师洛林·马泽尔生前操刀改编，盖因原版“指环”太过宏大，整个四联歌剧院竟然长约15小时，这对于试图了解瓦格纳的当代人而言无疑望而生畏。为那些想了解“指环”



梅明蕾 媒体人、爱好者、读写爱好者

的受众考虑，马泽尔慨然接下了这活儿，大刀阔斧地将这巨型史诗歌剧一举浓缩为70分钟的纯器乐作品，并于1987年亲自指挥柏林爱乐录制而成。

据称“无词指环”自首演以来广受好评，我想这是因为受众将此作为原创作品来听。而在一些“原教旨”瓦迷眼中，马泽尔改编版只是好听旋律的拼接和串烧，已然失去了原作的巨大戏剧张力，甚至是对瓦格纳整体艺术的“背叛”。更不用说库伦齐斯在当代古典音乐界本就以标新立异著称，尤其在献演“无词指环”时做出“出格”演绎，被瓦迷们诟病为遵循“效果主义”，彰显了感官刺激，却“牺牲了瓦格纳乐剧中那些需要时间沉淀的神圣性与叙事连贯性”。也许这改编和演绎的双重“误读”终于让个别“原教旨”瓦迷忍无可忍，遂在现场上演了不文明举止。

马泽尔虽挖空心思删繁就简，终究还想忠实再现“指环”之本来神韵；而库伦齐斯则从一开始就有打算，他筑他的音乐神殿，我按我的特立独行，执意打造出自己心目中的瓦格纳。

一百个人心目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信哉斯言。就像谭盾以东方视角解读贝多芬被西方业界认可，库伦齐斯式的标新立异理应承担更多包容。窃以为，“原教旨”的“忠粉”行为只能使解读经典之路越走越窄；更不用说那种“砸场子”的粗陋之举，无论他有怎样的理由，都必须立马将其请出音乐厅。

·序跋集·

食物“自古以来”就在运行

□罗新

“食物里程”(food miles)概念30年前在英国出现，它指的是食物从开始生产到最终抵达消费者手中的运行距离，计算食物里程可以反映食物运输过程的能耗及其对环境的影响。支持这一理论的人认为，食物长途运输会产生更多碳排放，损失营养且提高价格，因此，为减少碳足迹，运输更快，新鲜度更高，价格更低，人们应优先选择来自本地或本国的食物。

不过“食物里程”的计算及其立场从一出现就遭到许多批评。批评者指出，应该在更大的计算模型中观察能源消耗。经过比较，可以看到运输环节的碳排放其实并不大，甚至比不上消费者最终往返市场的那些能耗，更远比不上食物在养殖和生产环节造成的环境影响；相反，食物的全球运输网络给许多国家和社会带来的积极影响，是更具深远意义、更关乎人类未来的话题。在这个意义上，萨拉·默里的《流动的盛宴：不可思议的食物之旅》是一本非常棒的读物，因为它聚焦的就是食物在抵达我们的餐桌之前，究竟经历了怎样令人难以置信的旅程，以及这种我们通常不会注意的漫长旅程对于人类社会的变迁来说具有怎样的深刻影响。

萨拉·默里质疑将“食物里程”视为食物碳足迹的度量方式，指出还有许多其他因素需要考虑，计算能源消耗应包括从粮食收割到奶牛挤奶这样的生产设备、生产燃料和肥料、食物加工和温室农业，等等。她强调，要解决全球粮



摘编自《流动的盛宴：不可思议的食物之旅》推荐序。

食供应链的环境影响，必须了解食物从种子到厨房的能耗全过程。

这是一个严肃且充满争议的话题，然而萨拉·默里这本书却非常好读，故事精彩动人，细节丰满充沛，图书馆的资料查阅和在世界各地的田野调查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让人佩服作者对宏大图景与细节描摹的平衡能力。她讲述的故事，让我们看到食物如何“自古以来”就在尽可能地远方旅行，又如何能在远方“镀金”之后以新的身份回到故乡，食物旅行如何依赖技术创新，这种创新又如何深刻地推动人类社会的变化和发展。萨拉·默里告诉我们，即便一个从不出门远行的人，哪怕只在家门口的超市随便转转，他实际上就已经见证了甚至参与了许许多多极为复杂的全球旅行。比如，书中讲了作为挪威三文鱼全球旅行重要中转站的故事，原来全球市场相当数量的三文鱼都要先到中国，经中国沿海工人切片去骨之后，再次冰冻运往世界各地。那些在世界各地吃着三文鱼的人，绝对想不到他们的挪威鱼在上桌之前竟然在太平洋西岸逗留过一番。

技术革新和发明创造在利益驱动之下快速发展，世界各个角落的人都在以一种通常并不自知的方式参与这场全球化运动。书中讲述了许多动人的故事，到处是好玩却不大的知识，充满惊喜，值得一读再读。

·郭梅说剧·

伦理剧2025:不再是“保卫”或“逃离”

□郭梅

国产的家庭伦理剧经历着深刻的变革。

传统家庭剧的核心矛盾往往是家庭堡垒所遭受的外来入侵(如第三者)或内部问题(如重男轻女)，叙事动力在于“保卫”或“逃离”。而2025年热播的《六姊妹》《我的后半生》和《四喜》等剧集告别了过分倚赖“出轨、打小三、婆媳大战”的强冲突叙事窠臼，转而深入当代家庭生活肌理，探寻在高速变迁的社会结构中个体的存在困境与情感联结，被观众誉为“在我家安了摄像头”。显然，这并非简单的题材迭代，而是一场全面范式转型，将家庭叙事从封闭的私人道德场域推向广阔的社会经济场域，完成了从“伦理剧”到“社会剧”的深化。

《六姊妹》以六个亲姊妹之间的善恶之争为核心，描摹偏心母亲和大气祖母对六姊妹的不同影响，展现生活的真实，弘扬善良与宽容的家人相处之道。《四喜》则以一种极致的“强设定”将对家庭伦理的探讨推向哲学层面，该剧以传统戏曲《玉蜻蜓》里的生母、养母、寄母“三母争子”为故事模板，以生母、养母、祖母“三母争女”为核心矛盾，提出深刻的哲学问题：什么是家？爱的形式和本质如何统一？凝聚家庭的终极纽带是血缘？是日积月累的养育之恩？还是由法律或利益缔结的社会关系？剧中人不再被贴上简单的善恶标签，养母大度无私的爱、生母笨拙的弥补、强势而“势利眼”的祖母锥心刺骨的丧子之痛，共同构成了一幅复杂多维的亲情图景。可以说，该剧通过将人物置于血缘、恩情与伦理的漩涡中心，实现了对



郭梅 杭州师大教授，剧评人、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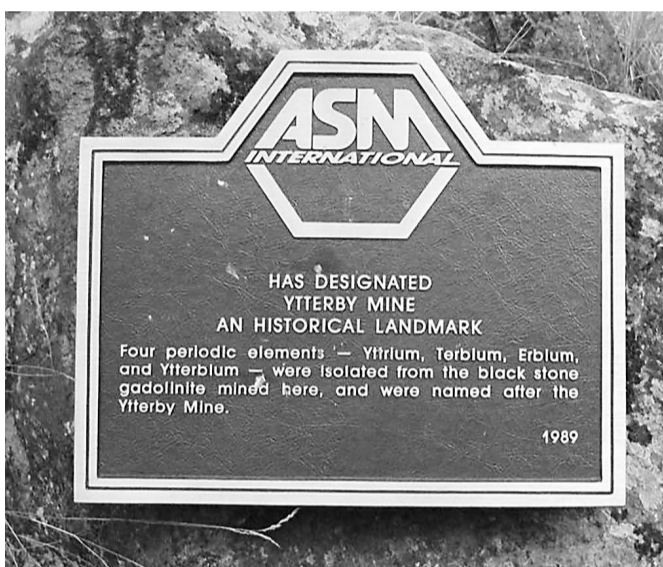
家庭本质的深层解构与重构，也提出了一个严肃的命题：女性该如何面对各种人生的大考，尤其是如何看待生恩、养恩和生育，将剧集的主旨从“家庭保卫战”迭代到“个体存在之思”。

同时，家庭伦理剧主题的深化必然要求叙事形式的革新，其探索路径有向生活本真的“下沉”和具备网络时代特征“数据库”式表达。如《我的后半生》聚焦银发婚恋，通过单元式的故事叙述，罗列了银发婚恋的各种“奇葩”现象，集中反映了当下的部分社会面貌，也提出了一定的反思，形成剧集与社会的“叙事共生”。这似乎在告诉观众，家庭伦理剧的社会功能正在从“讲述一个故事”扩展到“提供一个讨论的公共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家庭伦理剧的女性角色走出了“绝望主妇”一遭遇背叛一涅槃复出的悲情循环，其成长动力由外部刺激转向内部觉醒，其自我价值的实现也不再局限于职场争端的单一维度。女性的价值不再需要通过对抗男性或牺牲母性来证明，而是在复杂的关系网络中，通过持续的选择、沟通与自我界定来实现。她们可以是温柔的，也可以是强悍的；可以热爱家庭，也可以渴望事业；可以犯错，可以徘徊，但始终保持对自身生活的定义权。

从此世间有稀土

□羊顿(科普人、科学写作者)



过观察它与其他物质的反应，加多林确认这种新土确实具有不同的性质。

加多林把这种新土称为钇土。现在我们知道，所谓钇土其实是钇的氧化物，在加多林的时代，各种能够从其他物质中分离出来、却无法进一步分离出单质的金属氧化物都被称为“土”。

就这样，加多林发现了第一种稀土，也让钇(Yttrium)成为第一种以伊特比命名的元素。

此后，各路英豪轮番上场，围绕“伊特比石”大显身手，1843年发现了铈(Erbium)和铈(Terbium)，1878年发现了镱(Ytterbium)。对比伊特比(Ytterby)，就不难发现其间的联系。只有7个字母的一个单词，被用来命名了4种稀土元素。这大概是化学元素发现史上最重要的地名。

从汽灯到火石，稀土首次工业应用

在第一种稀土元素发现近百年之后，在爱迪生凭借电灯闻名世界之前，一位名叫韦尔斯巴赫的奥地利化学家用稀土元素点亮了夜晚，这是人类首次将稀土运用在工业上。

早期的灯是烧煤气的，有部电影就叫《煤气灯下》。煤气灯的原理是用铂和铈的硝酸盐溶液浸泡纱布，然后把纱布晾干制成灯罩。点燃煤气，火焰会把纱布烧掉，硝酸盐则在高温下转化为亚硝酸盐，继而分解为熔点很高的金属氧化物，形成一种坚硬的网罩。这种网罩质地较脆，在汽灯高温火焰的灼烧下，会发出明亮的光。但早期产品或因成本高昂，或因效果不稳，都未能真正推广。1885年，韦尔斯巴赫独辟蹊径，利用稀土尝试发光效果，成功研发出一种全新配方的汽灯纱罩——包含60%的氯化铈、20%的氧化镧和20%的氧化钇。这被视为稀土元素在工业上的首次成功应用，堪称“稀土工业的黎明”。

韦尔斯巴赫将纱罩浸液的成分列为机密，在多个国家申请专利，然后授权给各国厂商，只允许

他们使用由自己统一配制的秘密浸液进行生产。

然而，第一代稀土纱罩质地脆弱，且发出的光线中绿光过多，照明效果并不理想。与此同时，爱迪生等人的电灯技术正在迅猛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竞争压力。到了1890年前后，韦尔斯巴赫被迫关闭了工厂。

韦尔斯巴赫重整旗鼓。经过多次失败与尝试，他终于找到了那个堪称“完美”的纱罩浸液配方：硝酸钍1000克、硝酸铈10克、硝酸铈5克、硝酸铈1.5克，再加2000克水制成混合液。这一配比下的纱罩，发出的光线不再是恼人的绿色，而是更柔和、更明亮的光，使用寿命也大大延长。

1891年11月4日，改变历史的时刻，配有这款新型纱罩的稀土汽灯在维也纳歌剧院咖啡馆外公开亮相，其优异的照明效果立刻引起巨大轰动，以无味、明亮、安全、便宜的绝对优势风靡整个欧洲，迅速取代了旧式光源。他的工厂在9个月内就售出了9万盏新型灯罩。即便到了1913年，通用电气已造出廉价的钨丝灯泡多年之后，韦尔斯巴赫汽灯的全球年产量仍高达3亿盏。这种灯传入中国，被称为“白炽汽灯”。

这款新产品标志着现代稀土工业的正式诞生。因为汽灯纱罩的巨大需求，直接推动了对稀土原料的开发，进而推动了稀土分离、提纯等一系列产业链的发展。

韦尔斯巴赫后来发现了稀土元素的第二种应用——火石。在电解还原稀土金属时，铁质电极碰撞会产生火花，原因是形成了稀土-铁合金。1908年，他将800千克混合稀土加工成400万颗火石，这种火石成为打火机的核心部件，奠定了便携式点火技术的基础。

20世纪90年代以后，用滚轮的火石打火机渐渐淘汰了，但韦尔斯巴赫发明的火石仍在应用，堪称野外利器的打火棒就是用混合稀土合金制成的。

炮兵军官发现“黑石”

瑞典东南海岸外有个雷萨罗岛，小岛上有个叫伊特比的地方，在化学史上声名显赫。

人类史上，究竟发现了多少种元素？答案是，118种，包括20多种人工合成元素。这中间，稀土元素只有十几种，而单单借用“伊特比”作为名称的就有4种。

伊特比原本荒无人烟，后来有人在此开采石英石，供应给周边的玻璃厂和炼铁厂。矿场的归属权几经流转，到了1790年，被归于罗斯特兰德陶瓷名下。伊特比所在雷萨罗岛附近，驻有一个炮团，稀土元素发现史上第一个关键人物就在此登场——炮兵中尉阿雷纽斯。

阿雷纽斯对技术问题很有兴趣，结识了不少学界人物，包括罗斯特兰德陶瓷的“少东家”、研究化学的盖伊尔。阿雷纽斯接受盖伊尔的安排，到伊特比矿场考察。

他的注意力很快就被开采目标之外、废置一旁的伴生矿石吸引住了。那是一种带有玻璃光泽的黑色矿石，外观明显与矿场的开采目标不同，比一般矿石沉得多。他猜测这可能是一种新矿石，就把石头带回了家。

稀土元素发现史，就此肇始。

阿雷纽斯自己没有能力分析这种黑石的成分。最早将这一发现在学术界公开的是盖伊尔，他的论文在1788年发表，首先介绍了新矿石的物理性质，还列出了煅烧等初步化学检验的结果。

就这样，盖伊尔的家族矿场及其本人作为稀土研究拿出一块黑色的石头和一篇论文，阿雷纽斯则贡献了最初的发现和一个名字。因为矿石产在伊特比，他把这种石头命名为“伊特比石”。

加多林大显身手

接下来出场的是化学教授加多林。加多林也收到了阿雷纽斯寄来的伊特比石样品。1794年，加多林发表了自己的分析结果，他的实验要比盖伊尔深入得多。

加多林先是将其加热熔化为泡沫状的黑色矿渣。接着，他把磨碎的矿石粉末溶解在浓硝酸中，溶解之后，得到一种绿色溶液，不能溶解的部分在溶液中形成了白色粉末状的沉淀。他将沉淀物与碳酸钠一起高温焙烧，形成了透明的玻璃，说明白色沉淀的成分是二氧化硅。对于溶液，加多林也用碳酸钠处理，结果验证了盖伊尔的推测，确认这种矿石中含有铁。

接下来的操作，才真正显示出加多林作为一流分析化学家的水准。他继续往剩下的溶液中加入氨水，结果得到一种灰色沉淀，接着又用浓氢氧化钾处理，发现并没有进一步形成沉淀。加多林知道，钙、镁、钨这3种金属的盐在氨水中不会沉淀，但与氢氧化钾反应会形成沉淀，既然没有新沉淀出现，证明溶液中不含这3种金属。

他继续用浓氢氧化钾处理溶液，发现不仅没有新沉淀生成，已形成的灰色沉淀甚至会有一部分重新溶解。加多林认为重新溶解的部分是矾土(氧化铝)。持续用浓氢氧化钾处理之后，总有一些白色沉淀存在，他猜测这部分应该不是矾土，而是一种包含新元素的“新土”。接下来，通

快览

《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
章开沅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一部浓缩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以其中的代表人物和重要事件为主线，展现在中西文化相互激荡中近代思想文化演变的轨迹。本书写作于作者在拨乱反正之后学术精力最为旺盛、思想最为活跃成熟之时，其构思之巧，视野之广，见解之深，文笔之美，实堪称其代表作之一。

《遥望天上李元星：李元科普作品选暨百年诞辰纪念》
李元 著 李星燕 李兆星 李星玉 整理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25年是中国著名科普作家、科普活动家李元诞辰100周年。他是我国天文馆事业的开创者之一。太阳系6741号小行星以李元的名字命名，这是中国科普工作者首次获得该项荣誉。本书精选李元各个时期的科普作品30多篇，并收录他人撰写的纪念评述文章10篇，激发读者对宇宙的好奇与热爱。

《哲学、文化与人生智慧》
欧阳康 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本书源自欧阳康教授主讲的中国大学慕课“哲学、文化与人生智慧”，从“我是谁”“哲学是什么”“何为文化自觉”“如何塑造卓越人生”等问题出发，将哲学智慧、文化洞察与人生感悟紧密结合，涵盖元哲学、分支哲学及全球化文化议题，既关注哲学的重大和基本问题，也聚焦现代人的真实困境。

《传薪有斯人：李济、凌纯声、高去寻、夏鼐与张光直通信集》
李卉 陈星灿 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五位先生是中国考古人类学界的代表人物，本书收入前四人与张光直之间的通信近两百件。通信时间自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考古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展。书中的内容涉及许多鲜为人知的学界史事，真实地反映了生活在祖国大陆和海外考古学家的思想情感、研究取向和生存状态。

《无用知识的有用性》
[美] 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 [荷] 罗伯特·戴克格拉夫 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首任和现任院长，两位作者的两篇文章从科研说开去。书中以爱因斯坦、冯·诺依曼、奥本海默等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著名科研人员的例子，有力地证明了这样一个论点：在很多时候，科学家研究的“无用知识”才是改变人类命运的关键所在。简单的例子：没有量子力学，就没有电脑芯片。

《唐朝的灭亡与欧亚东部》
[日] 新见贤 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汗青堂丛书”第158种。作者深入剖析藩镇体制及唐帝国与周边欧亚势力的互动。安史之乱后，大唐并未轰然倾覆，而是在藩镇割据与内外互动中，延续了一百五十余年。唐之终章不是单线的“内政崩坏史”，草率了帝国的兴衰、海上贸易格局的重塑，共同塑造了后期唐帝国复杂多元的政治生态。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整理)

